



疫情期间，我足不出户，当了一回“宅男”。每天看电视，令我牵挂的是上海援鄂医疗队队员。他们临危不惧，救死扶伤，挽救了无数宝贵的生命。

春暖花开，英雄归来。看到白衣天使平安回沪，才算放心。企盼有机会能与这些英雄见个面，说一句：“谢谢你们，最可爱的人。”

前不久，我接到任务，带队去慰问正在接受体检的援鄂医疗队。我真作了准备，演员组成五个小组，分期为医护人员送欢笑。大家表示：“不管观众多少，一定完成任务。”

援鄂医疗队大部分是年轻人，他们朝气蓬勃，热爱生活。他们非常欢迎我们，每个节目都给予掌声和笑声。

这次活动非常人性化。疗养人员可以选择一位亲友陪同，其中一对母子引起我的注意，两人很亲热，共叙天伦之乐，似乎有说不完的话。

春暖花开，英雄归来

王汝刚

有人告诉我，这位男青年姓杨，是一家医院的男护士。母亲已退休。小杨为人忠厚老实，还没有女朋友，平时工作繁忙，经常上夜班。为了不影响到父母，他就在外租房居住。父母去看望他，往往搔头皮，大惑不解，怎会走漏风声？父亲让小杨看一段视频回放，这才解开谜团。原来，小杨在武汉工作出色，电视台记者要采访他，他却把同事推向镜头，自己转身而走，结果留下了侧影，这个镜头正巧被小杨父母看见，这才知道儿子在援鄂医疗队工作。父亲告诉小杨，母亲思儿心切，每天总要回看好几遍视频……

小杨泪流满面，与父母紧紧拥抱。他告诉父母：“有位女护士，经常和我一起值夜班，蛮有好感……”母亲提醒他：“约她谈谈。”小杨无奈地说：“没有时间谈恋爱。再说，大家都穿着防护服，我连她长得什么样子都没看清楚。”母亲忙说：“只要人品好，相貌不重要。”小杨回答：“在武汉机场，我第一次看见她的真面目，嘻嘻，蛮好看的。”母亲问：“你们平时靠什么交流？”小杨回答：“眼睛。”母亲兴奋地说：“这就是眉目传情呀。”小杨涨红了脸：“难怪我看见她的眼睛就会心跳加快。”父亲笑得嘴也合不拢：“武汉是个好地方，去了就能遇上意中人。你们快点结婚生孩子吧，小孩的姓名我也想好了，就叫‘汉宝宝’。”

小杨随医疗队回上海后，经过隔离观察等防护措施，终于可以回家了。出乎意料，母亲看见心爱的儿子，竟然“臭骂”：“你算翅膀长硬了，飞出去也一声不响。”小杨搔

上海新流行语刍议

岑荣萍



如今在有些场合，“上海腔调”成了流行语。所谓腔调，指音乐、戏曲、歌曲等的调子；说话的声音、语气。腔调的词义，本身是不含比较级的，没有高雅低俗高下的档次之分。形容腔调，要依语境而言，而且要搭配名词、副词或形容词。但过去上海提到腔调，多数是贬义的。过去骂人：啥个腔调，油腔滑调。《红楼梦》第八十回：“两个人的腔调儿都够使的了，别打量谁是傻子。”对上海特有的有档次的格调、情调和气质，用“上海腔调”一词覆盖，似乎是不准确的。词义品味总在细微之处，比如有格调，有情调，有气质，和有腔调比较，是不是层次不一样，前者更有档次。

关于“模子”，出自弄堂老话。在早期工业化的过程中，需要开模子，来生产和翻造产品，其含义有模板的意思。但模子的应用，同样要依语境而言，上海过去对模子的称呼，所谓撬边模子、连档模子、打桩模子、滑头模子等等，大都归于贬义之类。前几天看到新闻，民警儿子舍肝救母，被称为“上海模子”，听起来不舒服，为什么不用榜样、模范等更准确的词。地方语言，最终要融入普通话，为各地域的人们所接受，才有生命力。对“上海腔调”和“上海模子”，在一些语境是可以应用的。但本身含有歧义或贬义的词组，面对更广泛的地域来形容上海的特质，不仅仅词不达意，还产生有违本意的联想。一家之言，供参考。

想到即将要搬到洛杉矶，我的第一反应竟然是焦虑。身为上海人，回到大城市理应当鱼得水才是，然而，或许是最近几年在美国中西部小城住惯了，再看大城市反倒能看出很多荒诞来。

这一切首先源自找房子的经历。洛杉矶房价高，我早有耳闻，但让我诧异的是租房条件的低下。在圣路易斯，奖学金的一半或三分之一足以租一间体面的公寓，如果省一点，找个室友，可以租一间宽敞的两室两卫，合用厨房和客厅，因为各自保有私密空间，不仅不会有矛盾，还可以一同营造生活趣味。在洛杉矶，我也以奖学金的一半作为房租预算，结果发现连基本需求都无法满足。要么只能租一件逼仄的“单身公寓”，没

有厨房：好一点的给你台冰箱和微波炉，如果更糟的，连厨房的水槽也没有。想要厨房，就必须考虑室友，但绝非找一个室友就了事，往往要和三四个，甚至五六个陌生人住一起，很多时候还必须合用卫生间。更让人哭笑不得的是，大城市自有一套漂亮话来把“匮乏”包装成“奢侈”，冰箱和微波炉被称为“迷你厨房”，而接近“群租”的拥挤住房被叫做“共同居住”，后者甚至还被包装成某种生活哲学。

寻找洛杉矶租房信息的时候，我特别提醒自己要小心诈骗，或许过去中西部的租房网上也有骗局，但我没遇到过，可就在找洛杉矶房源的几周里，我见识了不少骗子。他们的套路基本上是：房主已经离城或者手机的摄像功能失灵，

不能带你看房子，交了押金之后，他们会把租约和钥匙快递给你。这些骗子为了增加可信度，往往说自己是诚信的人，或者拿自己的父母“发誓”，

大城和小城

钱佳楠

他们强调自己不是骗子，母亲等人教导他们要守信。虽然没有上当，但我仍然恼怒：在逐利的城市文化之下，原本神圣的东西不仅可以亵渎，还应当利用，而人们可贵的善良和质朴沦为天真和愚蠢。

德国著名哲学家、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西奥多·阿多诺提醒读者区分两种形式的“愉悦”，一种阻碍自由，另一种通往自由。前者有点像所谓的“罪恶快乐”，例如暴饮暴



石库门里的防疫(剪纸) 李守白作

他播撒科学的种子

王泠一

他走了，如秋叶之静美。六一儿童节那天他和读者们告别，银河厅里的每一个座位上都有一条鲜艳的红领巾。他的笔，启蒙了三代红领巾。作为六零后的我，知道叶永烈先生大名，也是因为戴上红领巾之后得到的奖励是他的科普书，就是闻名遐迩的《十万个为什么》。这套书，其实是我父亲王志华的珍藏；也是我当化

学老师的母亲杨建华的备课法宝。而我第一次有幸见到叶永烈先生，已是初中一年级的1980年了。在学校的礼堂里，我和同伴们听他讲科幻报告。报告结束之后，我们被鼓励提问；这种大师和红领巾的互动方式目前司空见惯，但在当时却是很罕见的。记得邻桌的女孩怯生生问他：什么时候可以不穿打补丁的衣服。我因为一周只能吃上两回大排，就问啥时候能够天天吃红烧肉。叶先生给的答案都是到2000年，即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时候。

叶先生还进一步解释说，四个现代化中最基础的就是农业现代化成就，这直接关系到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从那时起，我每年都关注农业现代化的进步。1994年，上海全面取消肉票、蛋票等短缺经济时代的基本消费品购物凭证。但是一直到今天，只要我吃上香喷喷的红烧肉，就会想起叶先生在母校礼堂里的笑容。

后来，叶先生由科普的主旋律转为专攻党史重大题材的纪实文学创作。1991年的七一前夕，也就是建党七十周年前夜，我以上海社科院研究生会主席的资格出席了团市委的青

党求是中国人优良传统。2500年来我们中华民族一直讲“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如今我们在提倡创新驱动，这是正确的，不过只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还要驱动创新，这是当务之急。现在“学奴”在增加，不是好兆头。要知道拾人牙慧，吃人家嚼过的馍是没有味道的。爬行主义是爬不出创造、创业和原始创新的。爱

勇于创新

——求学十部曲(之七)

邓伟志

因斯坦说：“若无某种大胆放肆的猜想，一般是不可能有知识的进展的。”在处理人与人、国与国的关系上要坚持求同存异，在学术之道上要坚持求异存同。要敢于挑战常识、挑战权威、挑战“不可能”，敢入无人之境、敢闯未知领域、敢破“未解之谜”，不云人云亦云，不谈老生常谈。我们常说：“出类拔萃”，只有跳出老掉牙的那一类，方能选拔出“萃”来。我们想超车，不换轨如何超车？在学术上要提倡换轨超车的创新精神。

而要换轨超车，必须胸怀大志。诸葛亮说：“非志无以成学”。读者都是“小诸葛”，请无论如何不要忘记老诸葛有关立大志的遗言。开创“贞观之治”的李世民在他论政的名著中写道：“取法于上，仅得为中，取法于中，故为其下。”什么意思呢？你想拿金牌，向拿金牌的方向努力，其结果可能是拿银牌；如果你只想拿银牌，那你肯定拿不到金牌，说不定只能拿个铜牌。可见，目标的定位很重要。卓越是你心中最强的力量，卓越是你身上最亮的光彩；希望你们绽放光芒，不能停留在眼皮底下的那片“小天地”、“小乐惠”。

从本质上来说正常人都是有创造发明的基因的。我们的内因决定我们有不断挑战自己极限的可能。从外因看，我们的大学就是一个让年轻人充分展示、尽情释放、激烈碰撞各种奇思妙想的集散地，是创新的源头、是从0到1的原创知识的基地。学术思想自由的大学校园使得每个角落都弥漫着创新的精神和创新的意识，新概念、新理论、新方法、新技术、新设计、新发明层出不穷。内因与外因决定大学生完全有可能把创新变成光辉的现实，干就干成一流、做就做到极致。

这里提一句不要迷信洋人。十多年前，我到美国的一号大学的一个学院，院长对我说：“我是中国工农兵学员。”我有点愕然。他继续说，他本是法国人，“文革”中在北京语言学院读过书。我笑了。从交谈中我知道他只写过两本著作。对此应该如何分析留给大家，我到此打住。

年代表座谈会，得到的珍贵礼物就是叶先生的史诗巨著《红色的起点》。这部长经典著作争相在同学们中间得到传阅，我们从来没有见过如此生动、活泼的党史纪实作品。

除了这些让我爱不释手不释卷的纪实著作，我还喜欢品读新民晚报夜光杯副刊上叶先生的各类随笔，如同一杯杯美酒，不知不觉中就陶醉。我现在知道，叶先生历经40年、共在夜光杯发表了309篇文章。而晚报读者，都是他文章的忠实粉丝。

八零后读者陈音音，是徐家汇街道党工委的公务员。五月下旬，我陪同上海市档案馆的同志去叶家慰问家属时遇到陈音音。她告知：自己是通过《十万个为什么》和夜光杯了解叶先生的。工作后，她发现社区居民叶永烈先生一家好有修养，是邻里和谐典范，不麻烦社区。叶先生自己除了外出采访忙、写稿争分夺秒，为人还很低调。

叶先生和夫人徐老师选择居住在徐家汇社区，是为了最大限度地节约通勤时间。叶先生在离家很近的上海科学教育电影厂工作了很长时间，1980年他执导的科教片《红绿灯下》获得第三届中国电影百花奖，轰动了整个弄堂。弄堂里常年居住的邻居，好多是大中华橡胶厂的职工。职工们常给叶先生夫妇讲改革的新鲜事，叶先生跟他们学讲上海方言，也常介绍自己创作中的科普故事。再后来，就经常有老师上门向叶先生请教如何推广科普知识。

七夕会

我每天都在做的事吗？

这是最初在中学里读到的，当时的我觉得富翁更可悲，他不懂得“清风明月不用一钱买”。但如今想来，渔夫就快乐吗？他或许仅仅把捕鱼看成是循规蹈矩的生活，而非自由。甚至，即便他懂得这边的自由，他的这种“自由”也岌岌可危，因为富翁随时可以买下整片沙滩，让他无家可归。

某种程度上，渔夫和富翁就成了我眼前的小城和大城生活的隐喻，没有哪一种是由快乐和自由的保证。但或许，就在渔夫和富翁狭路相逢之际，富翁理解了自己被金钱奴役的现实，而渔夫懂得自己生活的可贵之处，在这个精神碰撞和自主思考的瞬间，他俩离生活的真谛大概都更近了一步。